

中国开放型经济 建设 40 年 (下)

OPEN ECONOMY CONSTRUCTION
IN CHINA FOR 40 YEARS II

裴长洪 著

40
1978-2018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开放型经济 建设 40 年 （下）

OPEN ECONOMY CONSTRUCTION
IN CHINA FOR 40 YEARS II

裴长洪 著

40
1978-2018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内容简介

“开放型经济”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决议中，它概括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贸易投资和经济领域对外开放的基本特征。之后不仅在党和国家的重要文献里被不断重复，而且其内涵也不断丰富和完善。因此可以说，40年我国对外经济贸易体制改革和发展的整个过程，也是开放型经济建设的过程。

本书回顾了40年中国对外经贸体制改革的基本轨迹，分析了实现贸易投资自由化的中国经验和中国道路；总结了走向贸易投资大国的基本实践和经验，提出了迈向贸易强国的设计思路和利用外资的中国模式；探索了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理论解释和“一带一路”建设对中国海外投资的重大意义；分析了在经济全球化的不同阶段，中国从参与到引领全球经济治理的历史趋势；研究阐释并总结归纳了中国共产党创立的中国特色开放型经济理论，并论证了习近平新时代对外开放思想是中国特色开放型经济理论最新境界的理论认识。

下册目录

第四篇 中国企业对外投资与“一带一路”建设

第一章 对外直接投资:理论解释与中国实践	(435)
第一节 资本输出理论简要评述	(435)
第二节 中国企业“走出去”对国际经济学提出新课题	(436)
第三节 动力机制的考察:资本利益与国家利益	(438)
第四节 经营保障机制:中国企业的优势	(441)
第五节 行为主体机制:企业与政府的不同作为	(445)
第六节 结论与政策建议	(448)
第二章 国家特定优势: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理论	(451)
第一节 西方主流理论解释力的不充分和不完善	(451)
第二节 对外投资与母国:基本考察	(455)
第三节 对外投资的母国基础条件	(457)
第四节 对外投资的母国特定优势	(461)
第三章 内地企业在港澳特区的投资情况分析	(483)
第一节 内地企业在香港的投资分析	(483)
第二节 关于在香港招股上市的中资股份制企业	(486)
第三节 若干香港中资代表性企业	(489)
第四节 内地企业在澳门的投资	(492)
第五节 若干澳门中资代表性企业	(492)
第四章 对中国企业对外工程承包和重点领域投资的考察	(495)
第一节 对外承包工程:企业对外投资的重要发展路径	(495)

第二节	中国仍需加强企业境外石油投资开发	(499)
第三节	扶持工程建设企业“走出去”和海外石油开发投资的 政策体系	(505)
第五章	中国企业海外投资促进体系的构建	(514)
第一节	法律体系	(514)
第二节	监督管理体系	(516)
第三节	财税金融体系	(518)
第四节	知识产权与标准化体系	(521)
第五节	行业引导与跨国公司培育体系	(523)
第六节	风险防控体系	(527)
第七节	境外经贸合作区促进体系	(529)
第八节	海外证券投资促进体系	(530)
第九节	社会化服务体系	(532)
第六章	“一带一路”建设与中国扩大开放	(536)
第一节	“一带一路”倡议的内涵以及对曲解、误解的澄清	(537)
第二节	“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对外开放的大思路、 大棋局	(542)
第三节	关于“一带一路”建设的金融支持	(545)
第四节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政策措施	(548)
第七章	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增长与“一带一路”建设的 早期收获	(554)
第一节	世界直接投资的复苏与亚洲的对外投资	(554)
第二节	“十三五”期间中国将成为资本净输出国	(555)
第三节	“一带一路”建设的早期收获与前瞻	(563)
第五篇 经济全球化与中国参与、引领全球经济治理		
第一章	对后危机时代经济全球化趋势的探讨与分析	(577)
第一节	经济全球化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	(578)
第二节	经济全球化趋势中的新特点	(584)
第三节	国际分工与世界经济多极化新态势	(588)

第四节 中国仍然是机遇大于挑战	(596)
第二章 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话语表达、策略思想和	
主要目标	(601)
第一节 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历史经验	(601)
第二节 准确表达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主题设计思想	(604)
第三节 策略思想一:围绕主线、在多元利益诉求中建立 多边关系	(609)
第四节 策略思想二:新历史条件下的“韬光养晦”与 有所作为	(611)
第五节 主要目标:增强贸易自由化的动力机制	(614)
第三章 国际货币体系与全球金融治理改革	(617)
第一节 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缺陷与世界经济失衡	(617)
第二节 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化方向	(618)
第三节 国际经济金融治理架构存在的缺陷和改革路径	(620)
第四节 人民币国际地位与区域货币合作	(626)
第四章 经济全球化进入减速转型新阶段	(631)
第一节 英国“脱欧”意味着“去全球化”吗?	(631)
第二节 以往经济全球化的主要特征和矛盾	(632)
第三节 经济全球化新趋势:减速转型阶段	(635)
第四节 中国的应对思路	(637)
第五章 全球经济治理的理论分析范式与中国实践	(641)
第一节 问题提出与文献简述	(641)
第二节 全球公共品:全球经济治理的经济学含义	(646)
第三节 中国对全球经济治理的需求以及提供公共品的 能力	(653)
第四节 扩大开放与中国对全球公共品供给的能力建设	(666)
第六章 习近平经济全球化、全球治理改革思想研究	(672)
第一节 习近平经济全球化科学论述的新观点、新理念	(672)
第二节 习近平经济全球化新趋势的论断符合客观历史 规律	(675)

第三节	以往经济全球化的正负效应及其启示	(684)
第四节	中国应对经济全球化新趋势、改革全球治理的 实践思路	(694)

第六篇 中国特色开放型经济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第一章	“两个转变”:开放型经济理论的初步探索	(701)
第一节	实现两个转变之一:加快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	(701)
第二节	实现两个转变之二:转变在全球经济舞台上的 角色定位	(712)
第二章	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的理论探讨	(716)
第一节	开放型经济体系的概念和分析框架	(716)
第二节	中国开放型经济体系的发展现状与完善	(721)
第三章	中国特色开放型经济理论研究概述	(729)
第一节	中国实践对理论的呼唤	(729)
第二节	中国特色开放型经济理论的形成过程	(730)
第三节	中国特色开放型经济理论的基本品格: 实践与创新	(733)
第四节	中国特色开放型经济理论框架及主要研究内容	(740)
第五节	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借鉴和扬弃	(748)
第四章	习近平新时代对外开放思想是中国特色开放型经济 理论的最新境界	(756)
第一节	习近平新时代对外开放思想内涵简述	(756)
第二节	新时代历史站位上的新思想、新贡献	(757)
第三节	习近平新时代开放思想的政治经济学新观点	(762)
第四节	习近平新时代对外开放思想的物质基础与实践 依据	(769)
参考文献		(785)

企业，还是用借贷资本的形式输出，即用贷款的形式将资本借给输入国家，同时又往往规定以一部分贷款购买债权国的商品，其实质都是“资本输出成了鼓励商品输出的手段”^①。有的还通过契约，控制债务国的资源，一方面高价出卖商品，另一方面低价收购原料，从而取得高额利润。二战以前，资本输出的主要形式是借贷资本，西方经济学家主要把它作为国际货币流动现象研究，国际通货理论和国际汇兑溢价说成为解释国际借贷资本的主流学说。国际借贷理论是由英国学者葛逊（George Goschen）于1861年提出的，亦称国际收支说或外汇供求说。国际借贷理论认为，国际商品劳务进出口、资本输出入以及其他形式的国际收支活动会引起国际借贷的发生，国际借贷又引起外汇供求的变动，进而引起外汇汇率的变动。在一定时期内，假如一国国际收支中对外收入增加，对外支出减少，对外债权超过对外债务，则形成国际借贷出超；反之，对外债务超过对外债权，则形成国际借贷入超。古典国际证券投资理论认为，国际证券投资的起因是国际存在的利率差异，如果一国利率低于另一国利率，则金融资本就会从利率低的国家向利率高的国家流动，直至两国的利率没有差别为止。列宁从揭露资本的本质属性出发，指出富国对穷国的借贷往往附加资本母公司的贸易条件，因此是债权国试图从债务国的一头牛身上扒下两张皮的加倍盘剥。

第二节 中国企业“走出去”对国际经济学提出新课题

“二战”以后，资本输出逐渐转为以直接投资为主，而且主要发生在发达国家之间。按照联合国贸发会议的定义，从商业意义上说，直接投资与借贷资本（间接投资）的区别在于，后者只以资本收益为目标，而前者则不仅要取得资本收益，而且要取得经营权或经营控制权，这使经济学家的研究视野发生转移。外国企业投资东道国为什么要取得生产经营权，在已不具有殖民地特权条件下，它有何优势与本土企业竞争，从而保证其资

^①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第3版，（苏联）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本收益的目标?围绕这个问题,产生了当代国际经济学关于 FDI 理论和跨国企业投资与经营的解释,涌现了垄断优势论 (Hymer, 1960)、内部化理论 (Buckley, Casson, 1976) 和国际生产折中论 (Dunning, 1977; 1980; 1981; 1982; 1988) 等一系列学说,奠定了当代 FDI 理论的基本框架。这些学说主要是解释欧美最发达资本主义工业国企业跨国投资行为的理论,分析的范围主要适用于发达国家的相互投资。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一些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如日本的大公司先后开始了对外投资,对比欧美的大公司,它们的跨国投资行为并不具有十分明显的企业特定优势或内部化优势。如何解释其投资行为?日本学者小岛清 (Kojima, 1978) 以“边际产业转移论”解释了日本企业在东亚的产业转移中所形成的“雁行分工”,实际上是比较优势动态化地延伸,与邓宁的区位理论相接近。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国际直接投资现象日益纷繁复杂,南南投资乃至南北反向投资都大量出现,这使国际经济学教科书中的传统学说日益丧失对发展中国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解释力。Wells (1983) 提出了小规模技术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企业的比较竞争优势来自低成本,这种低成本优势主要来源于拥有为小市场需求提供服务的小规模生产技术;即使技术不够先进、经营范围和生产规模较小的发展中国家企业,也能够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来参与国际竞争。Lall (1983) 在对印度跨国公司的竞争优势和投资动机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技术地方化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的技术形成包含着企业内在的创新活动,这种创新活动形成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特有的优势。以上理论把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用微观层次理论予以解释,证明了发展中国家企业以比较优势参与国际生产和经营活动的可能性。

进入 21 世纪,针对发展中国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现象,涌现出大批新的跨学科研究成果。Bair (2005, 2008) 从经济社会学视角、Mudambi (2008) 从经济地理学视角、Schumitz (2004) 从发展经济学视角、Levy (2008) 从政治经济学视角、Ramamurti 和 Singh (2009) 及 Narula (2009) 从国际经济学视角,分别对发展中国家企业通过全球生产网络和全球价值链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路径变迁进行了分析。虽然研究视角各异,但是上

述研究得出相近结论,指出发展中国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不断增多的重要原因包括: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信息通信技术的进步、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从进口替代战略向出口导向战略的完全转型等,但是最重要的因素是全球生产网络和全球价值链的发展不断吸引发展中国家企业参与。起初这些企业是作为东道国企业参与国际分工,作为供应商融入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生产网络或全球价值链,通过技术外溢等渠道,不断积累自身优势,时机成熟时就走出国门,成长为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作为母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邓宁(Dunning, 1981; 1988; 1993)在其早期对投资发展路径理论(简称IDP理论)的基础上,又针对发展中国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将IDP理论和国际生产折中理论再度结合(Dunning and Narula, 2009),提出在吸引FDI过程中,发展中国家企业积累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最终三种优势同时具备,就可以成长为跨国公司,进而作为母国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

21世纪出现的大量FDI研究文献,虽然从全球生产网络和全球生产价值链的角度对发展中国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的变迁做了解释,但是发展中国家企业在国际化过程中如何能够像发达国家企业一样成为全球生产网络和全球生产价值链中的主导制造商或主导销售商,现有研究仍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20世纪90年代中国政府提出了“走出去”战略,进入21世纪,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异军突起,越来越成为东亚乃至世界直接投资的重要力量。中国企业特别是工业制造业企业,不仅在发展中国家投资,而且在发达国家投资,中国企业的优势在哪里?中国企业又如何构建国际生产体系?面对这种现象的大量发生,应当用何种学说来解释?显然,难以科学解释现象的理论,也很难用来指导实践的发展。这是国际经济学面临的新课题。

第三节 动力机制的考察:资本利益与国家利益

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其动力机制主要来源于公司企业的资本收益。无论是直接资本还是间接资本,资本最主要的属性就是逐利,投资者会根据资本收益大小决定资本流向。大量资本以对外直

接投资形式出现,是因为对外直接投资收益率比一般的商业贷款利息率高得多。在国际收支平衡表中,FDI 收益来自金融账户的直接投资项目,收益包括所有跨国投资者在东道国的各类投资项目获得的收入。根据世界银行的估算,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年平均投资收益率为 16%—18%,而在非洲的撒哈拉沙漠国家的年均收益率更是高达 24%—30%。2000 年以来,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长期高于外国对美直接投资总额,这一差额从 2000 年的 1106 亿美元迅速扩大到 2007 年的 9101 亿美元。与此相反,外资在美国获得的回报率却远低于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回报率。2003—2006 年,美资回报率分别为 9.5%、10.6%、10.8% 和 11.5%,而外资回报率分别只有 4.8%、6.0%、6.5% 和 6.9%。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中国吸引外资取得很大成就,不仅中国商业环境、吸引外资方面做出了努力,而且外商投资企业也获得了很大收益。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外商在华直接投资收益率为 13%—15%。

中国企业对外投资,不完全可以用公司利益最大化来解释。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背景下,在中国投资应是绝大多数企业的合理选择。根据中国行业企业信息发布中心《2007 年度中国制造业 500 强企业信息发布报告》,中国制造业 500 强企业平均利润率为 6.51%,烟草行业利润率最高达 17.30%,其次是饮料制造业 15.03%,利润率居第三至第五位的行业分别是塑料制品业 11.62%、造纸及纸制品业 10.94%、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10.36%。电子通信设备、钢铁、交通运输设备、电气机械及器材等行业利润率分别为 2.81%、7.38%、6.93%、4.77%。但是,毕竟发生了大量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现象,2002—2008 年中国企业年度对外投资额从 27 亿美元增长到约 560 亿美元,年均增长速度达 66%。截至 2008 年年底,中资企业的境外投资存量达 1840 亿美元,境外资产总额超过 10000 亿美元。在逐步成为国际直接投资生力军的同时,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动力机制需要重新考察。

目前,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构成中,主要是国有企业。虽然从 FDI 流量考察国有企业所占的比重在逐年下降,但是从 FDI 存量考察,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占主导地位。按对外投资的企业数量计算,2008 年有

限责任公司居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首位，国有企业的比重下降居第二位，但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规模考察，2008年国有企业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中所占的比重高达69.6%，居第一位。根据商务部统计，截至2008年年底，在国资委监管的136家中央企业中，共有117家发生了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占中央企业总数的86%。2008年年末，中央企业在全球127个国家（地区）共设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1791家，当年对外直接投资流量357.4亿美元，年末累计对外直接投资达1165亿美元。

在世界制造业500强和服务业500强的中国企业中，也主要是国有企业。根据《财富》杂志的排名，2003—2009年间，中国企业进入世界500强的企业，2003年为11家，2004年为15家，2005年为16家，2007年为30家，2008年为35家，2009年为43家。2009年，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国家电网公司进入全球前20强。在中国从事对外直接投资的国有企业中，以大中型国有企业为主，包括大型工业企业集团（首钢）、大型专业外贸公司（中化、五矿、华润）、大型金融机构（中银、中信）等。相较于其他国家，中国的情况具有更大的特殊性。由于历史原因，中国大型国有企业占经济总量的比重很高，战略性的能源、矿山、钢铁、机械装备、军工等行业都以国有企业为主。这些企业中相当大一部分开展了对外直接投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以国有企业为主，得自政治体制的异质性资源是这些企业竞争力的重要来源。

在中国对外投资的总金额或企业中，寻求自然资源输入的投资行为占很大比重。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前，中国自然资源类FDI占总FDI的45%；2008年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后，在中国海外并购活动中，自然资源类的并购活动占到了中国海外并购的85%。国际市场供应不稳定，国内资源供给不足，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鼓励中国企业以对外直接投资的形式建立海外资源供应基地，获取短缺资源，可以降低单纯依赖资源产品进口的不确定性。中国资源导向型FDI符合国家的整体利益，不仅有利于战略安全，也有利于企业赢利。此外，通过投资银行业务保持外汇资产的保值增值和通过商业设施投资促进对外贸易，规避贸易壁垒也占重要比重。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收益更多或更直接地体现为宏观经济利益，

而企业的微观利益是被兼顾的。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实践表明，国家利益高于企业的商业利益，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以政府政策驱动型的对外直接投资为主。对外直接投资作为一种跨越国界的经济活动，是在中国母国政策和东道国政府政策双重约束条件下产生的。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政府一方面鼓励吸收对外直接投资，另一方面鼓励本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中国政府采取的“双重鼓励政策”促进了外资对华投资和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迅速发展。中国政府鼓励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很大程度上具有实现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目标的意义。从宏观层面讲，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战略应当符合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利用两种资源，开拓两个市场”的目标，充分发挥对外直接投资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

资源导向型对外直接投资，最能体现政府主导型的对外直接投资，即国家鼓励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开展资源导向型对外直接投资。中国的跨国公司在海外资源领域的投资，尤其是在石油和天然气资源丰富的国家投资，就是出于国家资源安全战略的考虑。中国的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保证多种原材料供应的目的，还与中国在非洲、中亚、拉丁美洲与加勒比地区以及西亚平行而持续的外交努力互为补充。市场导向型投资则更多地兼顾国家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需要。世界经济和产业结构不断发生着重大变化，而且仍处在不断的调整变化之中。中国可以利用对外直接投资进行产业部门结构调整，把高技术产业、技术知识密集型生产部门作为国内重点发展的对象，而将某些传统产业和国内已进入成熟阶段的技术、产品移往国外。由于很多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日益趋同，各国企业所面临的国家间市场竞争压力不断加剧，为了更好地利用国际市场，中国政府应积极鼓励这类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以开拓国际市场。

第四节 经营保障机制：中国企业的优势

发达国家包括一些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企业，无论制造业还是服务业企业，其对外投资都不同程度地凭借其企业特定优势，如技术、专利、品牌、管理、整合资源的能力、以自身为核心的价值链和供应链、内部市场等。中国企业的竞争优势与发达国家企业有很大的不同，主要表现为大规

模低成本生产、局部技术创新、市场定位能力及市场销售能力。中国企业的这些优势是基于中国本土的特征而形成的。在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中，它并不能够将这些优势复制到东道国。中国的大规模低成本制造是以中国众多的适龄劳动力为基础的。另外，企业的低工资使得中国劳动力成本较低，从而使得中国企业能够形成大规模低成本的生产优势。而到其他国家投资必然要受东道国国内劳资政策的制约，不能随意降低劳动力成本。中国企业的市场定位和销售能力，也是以中国的国内市场为前提的，离开了中国的市场环境，这样的优势不再成为其优势，甚至可能变成劣势。所以，中国企业并不具备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垄断优势，垄断优势理论及以垄断优势理论为基础的传统理论不能很好地解释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中国企业的竞争优势与一般发展中国家企业的竞争优势也有很大的差别。根据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理论，发展中国家的跨国企业拥有的优势主要在小规模制造和技术地方化两个方面，而中国企业所进行的制造活动绝不是小规模制造，而是利用中国劳动力成本低的有利条件，进行大规模制造。所以，一般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也不能很好地解释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而根据小岛清的“边际产业投资”理论，一国对外投资的产业应该是在投资母国丧失国际竞争力的边际产业，中国正在加紧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基本上都来自逐渐形成国际竞争力的产业。所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不是在本国逐渐丧失竞争力的边际产业，而是正在形成国际竞争力的优势产业；而且，当前中国也并不具备国内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先决条件或优势。

正是由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几乎都不具备上述垄断竞争优势，因此，中国制造企业“走出去”的经营业绩其实并不理想，难以得到这些企业经营业绩的统计资料和信息就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这一点。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未来中国企业“走出去”完全缺乏国际竞争优势的前景呢？答案是否定的。首先，有一个行业是例外，这就是工程建设行业。中国30多年的高速增长中，建设了大量基础设施，2009年，ENR榜单上进入全球承包商225强的中国企业为50家，海外业绩进一步增长，平均营业额增幅明显。中国50家企业共完成海外工程营业额357.14亿美元，同比增加57.4%；企业平均营业额达7.14亿美元，同比增长了60%，说明行业

集中度在进一步提高。20 世纪 80 年代初，邓小平等老一代领导人批准了三家工程承包企业走出去，至今已有近 40 年的历史。中国的工程承包企业在世界工程建设市场中已经从简单的劳务施工承包，成长为可以承包设计、技术管理和施工管理到交钥匙的总承包商，是目前中国所有行业中唯一具有对外直接投资所需要的企业特定优势的行业。但是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统计中，中国工程建设企业被忽略，其原因是走出去初期主要是劳务施工承包，因此，始终被作为劳务输出或服务贸易出口，经营业绩也主要以营业额计量。从 20 世纪后期开始，海外的中国工程建设已不再是简单的劳务施工作业，而是已经转变为伴随技术、设备和管理输出的投资型企业。它不仅投资于施工项目的建筑材料和工程材料的生产经营，也投资于相关的生产经营领域，甚至是施工东道国所给予的优惠投资领域。以开辟海外工程建设市场带动其他投资领域，是未来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重要趋势。但是，这种发展趋势需要国家有意识地引导才能实现。

中国的工业制造业企业绝大多数是小企业，单独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很难具备企业优势，但在中国高速增长的 30 多年中，中国中小企业依托各种类型的经济技术开发区和产业带，形成了产业集聚规模和工业生产的相关支持条件，使这些中小企业获得了很强的生命力和活力。能否在海外成功复制这种产业集聚优势，是中国制造企业“走出去”是否具有国际垄断竞争优势的决定因素。

产业集聚可以带来外部经济效应，节约交易成本，刺激学习与创新，产生品牌与广告效应等。Kogut (1984)、Porter (1986) 都论证了产业集聚有利于形成企业的特定规模经济优势。Smith 和 Florida (1994) 发现日本汽车企业及与汽车相关的制造企业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会选择与其他日资汽车装配企业邻近，认为前后向关联是产业集聚和集聚经济产生的重要原因。Headetal (1995) 分析了日本企业在美国的投资区位问题，发现日本制造业投资趋向和同一产业中其他日资企业邻近，而不是简单地模仿该产业中美国企业的区位选择模式。Markusen (2000) 认为 FDI 是促进特定产业及关联产业的集聚形成与周期性演化的重要原因。Black 和 Henderson (1999) 的研究表明，资本品制造业有高度集聚的趋势，产业就业规模与本地制造业就业规模高度相关，因为资本品产业通过集聚可以获得

供求关联的外部经济，这类产业的发展与本地上下游供求关系紧密相关，在为本地产提供投入的同时，也从本地获得自身所需要的投入。Raffaello (2007) 认为，产业集聚及其发展水平是决定 FDI 的区位选择与流入量的关键因素。

FDI 具有培育当地产业集聚、促进带动产业集聚的作用。东道国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务，可以成为区域产业集聚向心力的来源。母国政府如何为本国企业在东道国形成产业集聚创造更好的环境和条件？对于产业集聚的形成，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1998）把集群分为两类：依靠内生力量自发形成的集群（Spontaneous Cluster）和依靠外生力量人为形成的集群（Constructed Cluster）。这两种集群的形成机理和动因存在很大区别：前者主要靠本国公司的内力驱动，其集群自下而上地发展；后者主要是建立在大量外国直接投资的基础之上。在资本迁移模式下形成的产业集聚、起推动和促进作用的迁移性资本是外商直接投资。作为 FDI 母国可以有意识地引导同类企业和相关企业朝某个东道国投资区域聚集，从而形成一定规模的产业集聚。近些年，中国在创新企业海外投资方式的实践中，创办了不少“境外经济合作区”以及其他类型的海关特殊监管区，以此吸引企业的投资集聚。这种特殊经济区的建立和完善，展示了复制国内产业集聚优势的前景。

政府行为是产业集聚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Osborne 和 Gaebler (1992) 认为，在全球竞争环境中，政府仅仅依靠公共服务和保障是不够的，必须是积极的“企业型政府”。无论是内生性的本地产业集聚还是外生性的 FDI 产业集聚，它们的发生和成长都受到成本导向机制、市场导向机制和政府推动机制这三种机制的交互作用。中国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方式进入东道国地方产业集聚有两种方式：一是以关键企业为龙头，带动一大批国内专业化供应商和配套企业去东道国投资，政府应该制定相应的产业政策，积极引导中国企业在东道国投资的产业集聚方向及其质量；二是通过上述特殊经济合作区域的建立，整合投资母国和东道国的各种政策扶持和服务设施、服务体系，形成吸引投资的有力磁场，形成一定规模的产业集聚，并与本土企业建立起前后向关联，发挥 FDI 的溢出效应，带动东道国更大范围和更高水平的产业集聚形成。中国政府可以通过政府政策